

# 独具特色的高淳庙会

□郭肖蕾

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经济、文化活动密不可分，至今仍长盛不衰。各地庙会，一般是在各种节日和各种神的所谓“诞日”举行，在农村还要加上春秋社戏的习俗。除了演戏，奉神像出巡是庙会另一项吸引人的活动，既是为了酬神祈福，又可以满足百姓放松身心、调剂生活的精神需求。

本文调查的是江苏省高淳县的薛城和长乐两个村子的庙会情况。高淳县地处江苏西南部，位于南京市西南端。由于高淳地处吴头楚尾，故民俗文化兼有吴、楚风韵，既深厚悠久，又特色鲜明。薛城村和长乐村都属于淳溪镇，位于高淳县城北约4公里。

薛城村在农历三月十八举办花台会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戏台是一次性的，演过就要拆掉，因此每次都是新造。现在造一次花台的成本大概要40万元左右，这对薛城的农户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因

此，一般是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起商量当年是否演花台戏，结果会在农历正月初二用升旗的方式公布：升一面旗，庙会就演场草台戏；升两面旗，那就是搭花台了。薛城村上一次举办花台会是在2001年，到2008年，当地人也已经7年没有看到花台会的热闹场面了。

笔者曾在2008年4月1日来薛城村考察过花台会戏台搭建的过程。整个花台长18米，宽16米，台面（地面至台顶）高约14米，占地近300平方米。舞台为钢架结构。笔者在那里见到了正在绘制画板的老艺人邢华桃，笔者询问是否有画稿时，老人答没有，全在脑子里。画板的绘画题材丰富，包括了很多民众熟知的典故：麻姑拜寿、和合二仙、贵妃醉酒、昭君出塞、米芾拜石等。这些画板主要是装饰在花台的藻井上的。

4月21日下午，笔者再次前往薛城村，在距离会场大约2公里处就因为人流过多、车辆无法前进而需要下车步行，路上

的行人大多是朝着花台会的方向去的。在靠近花台会大约1公里处的道路两边，摆满了出售各种商品的摊点，商品种类繁多，从各种农具到小型的家具，衣服、鞋帽、玩具、小吃等，百货骈集。

笔者还未走进薛城村，远远地就已经能望见高大的花台了。完工以后的花台的确是花团锦簇，气势非凡。台面中间塑福、禄、寿三星泥像，两旁塑八洞神仙。台口上方有五彩架。花台的藻井由数十幅彩绘画板组成，笔者在前期考察时见到的邢华桃老人绘制的画板已经装裱在藻井上。五个彩屏中间悬挂着一块匾，匾额以墨绿作底色，从不同角度去看，可反映出不同的字样：从正面看为金色“玉堂春”，从右侧看是紫金色“玉楼春”，从左侧看到的则为银灰色“玉树春”。戏台前沿立有两根描金龙柱，柱头大枋下吊着五彩宫灯和元宝形的花篮。花台正面两侧有“花妍宝地，地启文风，风范古今，今存遗址六千载；楼满笙歌，歌迎奥运，运逢

盛世，世誉江南第一台”的长联，花台前后还悬有“鸪天”和“近水楼台”的匾额。

薛城村的花台正对着古社，古社中供奉着祠山大帝、邢姓祖先神刑天大王、二郎神、龙王、四娘娘以及孔圣人。花台会的选址也是符合中国传统庙会的特点的。因为无论是庙会还是唱戏等活动，其产生的最初动机就是娱神，把戏台搭在薛城古社对面就是这种意思。另外，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不像欧洲社会有比较大型的公共广场，其庙会以及各种娱神活动的集聚中心，就是各地的寺庙或古社所在。虽然寺庙是庙会活动的中心，但这类活动又绝不局限于寺庙，它在空间上具有开放性，活动从寺庙一直延伸到附近的主要街道，甚至贯穿整个村落。无论形式如何，这些活动都以寺庙为中心，以不同的社区为单位，形成了一个同心圆。生活在这些同心圆中的人们，几乎都被卷入到活动中，从而突破了单一的镇、村等生活空间，体

现出极强的全民参与性。像这次来薛城逛花台会的人不仅有附近乡、镇的村民，还有很多是高淳县城的市民。这不仅增加了活动的热闹程度，而且还体现了以薛城古社为中心的社区之间乃至城乡之间的联系。

这次来薛城花台会演出的是江苏省京剧团，在花台的右侧挂着一块小黑



薛城村花台会

板，上面写着当天和次日要演出的戏码《白蛇传》和《玉堂春》。薛城村的村民会在花台会期间邀请亲朋来家做客听戏，出嫁的女子也会在这个时候回娘家，花台会期间这个不大的村子里处处洋溢着过节的热闹气氛。

紧邻薛城村的是长乐村。该村地处石白湖与丹阳湖交界处，村民以夏姓和杨姓居多。据村中老人讲，北宋末杨、夏两族为避战乱，来到苏皖交界的石白湖畔，择一狭长芦墩定居下来，并定名为长芦，又名芦溪，清同治十二年更名为长乐。

在长乐村的民俗文化活动中，五显庙会的粼粼车堪称一绝。长乐村出粼粼车的时间也定在三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日。尤其是薛城村办花台会时，长乐村就一定会出粼粼车，因为村民相信薛城村是“公鸡地”，而长乐村是“蜈蚣地”，公鸡、蜈蚣总是相斗，公鸡吃蜈蚣，蜈蚣吃鸡骨。所以只要薛城村唱起了花台会，长乐村就一定以粼粼车应战，否则就落了下风。和薛城村办花台会一样，五显庙会的粼粼车的费用也是由村民自愿出资的，村民出资多少，最后都会张榜公布。

粼粼车，又叫“龙吟车”，是以木龙为主要雕饰的巨大独轮推车。其轮径1.43米，龙头在车前，龙尾在车后，雕龙全长4.13米，车高3.3米，车身两边

的卫杆长7.84米，车重1000余斤，出游时得由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推车才能缓行。车上站有4人，一成年男性穿红袍，戴白色面具，顶魁头，举长刀，为五显神。另有两个孩童，一穿红袍戴红色面具，一穿白袍戴蓝色面具，为水、火二童子。还有一人侍卫装扮举一华盖。

据村中的老人讲，粼粼车早在南宋时就出现了。五显神，其信仰圈主要分布在以江浙为中心的地区，虽具有“淫邪”神格，在清初还曾一度被禁，但还是有相当的基层民众的土壤。在民间，庙宇香火是否旺盛，往往取决于神祇是否灵验，人们对于地方性神祇的灵验程度总是看得很重的。长乐村中的五显庙是清嘉庆年间所建，香火一直很盛。

2008年4月22日（五显庙会的第二天）上午9点，仪式开始。魁头被从五显庙中请出，并由事先已经选好的人顶上。所谓魁头，其形状为密匝的金色树叶，叶丛中散立各路神仙，魁头上的人物为泥



长乐村五显庙会的粼粼车

捏，其余为竹木制作，以模拟的神山天界作为所供主神的背景，一般是置于神像的头后，可戴在头上，或置于肩部。魁头一旦被人顶上，顶着的人就具有神性了。首先由村中一长者面对“五显神”低声祷告，这叫“说好话”，大意就是请五显神保佑长乐村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然后杀一只鸡，将血滴在地上的酒杯里。祷告完毕，围在一边的数十个推粼粼车的壮年男子将酒饮毕，把要站粼粼车的4人扶上车，这时鼓乐声、鞭炮声四起，众人推起粼粼车，请神出巡。

粼粼车出巡的路线是沿着村中一条狭长的路由村东到村西行进，然后再原路返回到五显庙，全长大约十米左右。村路两旁早就挤满村民，途中还设有多处路祭点，有村中的老人在守候，粼粼车一到就点燃鞭炮并焚香祷告。在粼粼车的前面有十个孩子举着各色彩旗开路。旁边的村民告诉笔者，这十个孩子也是事前精心挑选的，要父母健康，家庭声誉好才有资格举旗。接着是数十个年轻人举着“蜈蚣旗”。“蜈蚣旗”是挂在竹竿上的长条旗，长约6米，边为犬齿状，两边还缀有铜铃，行进中发出清脆的响声。旗上书“四化歌声彻霄汉龙吟车高接九天，长旗领先传捷报预告丰收大有年”。“蜈蚣旗”十分高大，需两个壮年合力才能举起。随后粼粼车就缓缓而行，巨大的独轮推车在前进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车上举华盖的人在行动中不断转动手中的长柄。在粼粼车的后面还有四架“抬阁”，“抬阁”中各有一男一女两个孩童以戏装



魁头一旦被人顶上，顶着的人就具有神性了。

亮相，后还有一队孩子表演蚌舞。这一队人马行至村路终点，再后队变前队，原路返回五显庙。整个出巡活动在上午11时许结束。

通过对薛城村花台会和长乐村出粼粼车这两地活动的实地考察，笔者发现，虽然作为庙会来说，薛城村的花台会和长乐村的粼粼车巡境仪式活动形式各有不同，但贯注其中的原则却是共通的。总的来说，其具备了各地庙会普遍具有的娱神、娱民、贸易兼凝聚社区的功能，还具有地域特色，那就是地区宗族、社区势力与庙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神或称祖神崇拜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维系本地域人口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薛城村和长乐村之间不过有1公里距离，却各有自己的地域神。薛城花台会敬的是祠山大帝、





抬轿车上的“五显神”

邢姓祖神刑天大王、二郎神、龙王等，而长乐村出抬轿车的传统则和五显神信仰结合起来。这点就与北方的庙会通常是围绕着若干普通信仰的神祇，像关帝庙会、城隍庙会等不同。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著作中曾列举了浙江鄞县的40例庙会，名称没有重复的，可见江南地区的地域神之多。究其原因，正如学者赵世瑜所指出的，南方地区因地理为众多江河分割以及距离政治中心较远，缺乏对文化主轴的向心力，故而在本地域发展起相对独立的文化。这样就使宗族或社区的首领通过组织庙会活动达到维系本宗族或本社区的目的成为可能（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通过笔者的调查发现，高淳虽离南京不远，但因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多靠水、陆

两路与溧阳、安徽宣州等横向地带进行文化、婚嫁等方面的密切交流，而与南京的纵向来往就很少，几乎没受到什么六朝都市文化的辐射。历史上高淳也无大量的外地人员流入，本地人也很少到南京去，直至今日，其语言体系仍属于吴语区，其封闭性可见一斑。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宗族首领在村中大小事务上仍具备一定的控制力，无论是薛城的花台会还是长乐的五显庙会，从是否举办到筹款再到仪式的主持，宗族首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宗族影响力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设置的基层行政系统在管理层面上的不足。

在现代社会中，像薛城村和长乐村这样的庙会活动仍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一是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并未真正树立起来，再加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仍然存在，人民群众自身的一些生产、生活的问题无法解决，而来自国家政权的法治资源、道德资源与文化资源又不可能迅速渗透于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人们在努力生产的同时还渴望得到心灵的慰藉。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民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短时期所能解决的，也不可能完全靠行政手段来解决。所以，对于庙会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积淀，理解我国民众独特的精神内涵和社会需求，也有助于我们对此进行引导，使其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